



# 斯拉维支小说集

# 斯拉维支小说集

高骏千 杨静远 范之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Slavici  
NUVELLE

---

据 Ana Cartianu 英文译本 "Ioan Slavici: Short Stories"  
("The Book" Publishing House, Bucharest, 1955) 转译。

斯拉维支小说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850×1168 套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2}$

195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1,001—31,000

---

书号 10019·684 定价 1.00 元

## 前　　記

一八六九年底，两个从相隔很远的地区来到的羅馬尼亞大学生，在維也納相逢了。其中一个剛二十岁，出生在摩尔多瓦的一个村庄里。他曾經不止一次地从学校里逃跑出来。沒有学校的帮助，凭借自己的力量，他获得了使人惊讶的学識。他又曾經用許多年们的工夫漫游羅馬尼亞全国各地，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經驗。他曾經从事过許多种艰苦的职业：他当过舞台提示人，在多瑙河的一个商埠上做过码头工人，还当过文书——为了求得最简单的生活而挣扎。他就是后来在羅馬尼亞的詩坛上大放光彩的米哈伊尔·埃米内斯古。另外的一个，来自西德兰斯瓦尼亞的一个村庄，他就是伊昂·斯拉維支。

斯拉維支比埃米内斯古小两岁，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的一八四八年，他出生在奇里亚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个皮毛商人，祖父在拿破伦时代是个燒炭党人<sup>①</sup>。七十岁的老祖父給斯拉維支講过許多故事；在他后来的許多作品中，都能找到这些故事的影子。这位未来的作家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种可貴的教育，她教育他不要憎恨和輕視其他民族。在德兰斯瓦尼亞这样

<sup>①</sup> 十九世紀初叶那不勒斯王国国王穆拉治世时亚不路息組織的祕密党，以推翻王政宣布共和为目的。——譯者注。

一个各民族杂居，民族压迫、官方政策又一贯挑撥各民族互相仇視、互相厮杀的省份里，这种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斯拉維支在家乡的村子里进了小学，后来又在阿拉德和底密索拉进了中学校。假期中，他常在德兰斯瓦尼亞的群山和村庄里徒步旅行。在布达佩斯上了一年学以后，因为經濟困难，他不得不暂时停学，到德兰斯瓦尼亞的一个小城里去給一个公証人当文书。他在一册回忆录中告訴我們，就是在这个小城里，他收集了一些有关当时生活的典型事实，特別是一些足以証明地方当局与强盜勾結的事实——他們支付給强盜們一笔巨大的款项，作为保障大庄院安全的交換条件。这种情形，我們将会在斯拉維支后来写的一篇短篇小說“吉利的磨坊”里遇到。

在公証人事務所工作的期間，斯拉維支有了足够的积蓄，便来到了維也納。

与埃米內斯古在維也納的相逢，对于这位短篇小說家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埃米內斯古指导他閱讀和学习，鼓励他写作，耐心地帮助他在文学上作初步的尝试，甚至还替他修改最早几頁作品的风格，删除了大量的方言。“因为我的文字不純洁，”斯拉維支以他特有的谦虛說，“他替我審清草稿，仔細地修改。”

这一时期，斯拉維支写作了他最早的作品——一部喜劇、一篇故事、以及一篇散文。

斯拉維支在維也納一面学习，一面在军队中服役，同时教一些学生来維持生活。可是經濟困难又一次逼迫他中止了学业。有一个时期，他在阿拉德当文书，以后到了奧拉地亞—瑪爾；接着，他得了一場大病，在維也納一个医院里度过了一些时期以后，一八七四年，他回到羅馬尼亞，在雅西定居下来。

在雅西，他重又开始文学活动，在埃米內斯古的指导下，写

成了短篇小說“唐托老爹”。他參加了文学团体“少壯派”，同时为这个团体的刊物“文艺杂談”写稿。就象埃米內斯古和卡拉迦列一样，斯拉維支，这个皮毛商人的儿子，这位将在作品中集中描写貧苦人們的作家，在貴族化的“少壯派”的圈子里感覺到十分陌生不自在。“在这个号称高雅的团体中，我感到完全是个陌生人，直到今天，我仍旧无法使自己适应它，”斯拉維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人們”中这样写着。虽然沒有明确的哲学思想，斯拉維支却拒絕了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文学上的唯美主义，而这两种思想正是“少壯派”的主导思想。

斯拉維支移居到布达佩斯，当了一名薪俸很低的公务人員。后来，他又做过教員，这个职业，他几乎連續不断地干了几十年。他还做过报刊的工作。在“时代”編輯部里，斯拉維支与同时代——也可以說是整个罗馬尼亞文学史上——最偉大的两位作家埃米內斯古和卡拉迦列一同工作。斯拉維支后来記述了他們三人在語言問題上引起的长期的激烈爭論。斯拉維支和他們兩人都有同样的看法：“我們必須从人民的头脑和心灵中得到启示，各地的罗馬尼亞人应用的語言就是最好的語言。”他对于語言的这种看法使我們了解斯拉維支总的傾向是很有帮助的。

一八八一年，斯拉維支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普通人的故事”。这个集子里包括了他最优秀的几篇小說：“布独里亞”、“吉利的磨坊”和“唐托老爹”。

斯拉維支的短篇小說——几乎他的全部作品，除了个别例外——都取材于乡村生活。但是，和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內开始流行的反动的“播种者”派相反，斯拉維支既沒有給它披上一件家长制的外衣，也沒有用牧歌式的色彩来加以描繪。他作品中的倫理觀點以及某一种类型的英雄人物表达了他对于人民的看

法；这种看法說明他是个真正的現實主义者。斯拉維支所描绘的乡村，不是虛幻的牧歌，而是具有它自己的历史特点的德兰斯瓦尼亞的乡村，同时充滿了雇农与富农——在德兰斯瓦尼亞叫“加茲德”——之間尖銳的冲突。这种冲突簡直是处处都能見到，有时候，富农的儿女和貧苦农民的儿女之間的爱情就因为这个緣故而受到挫折。資本主义侵入乡村，触发了人們向上爬的野心，斯拉維支描写了不少为这种野心俘擄的人物；金錢毒化了人們的良心，終而身敗名裂，害人又害己。“財宝”和“吉利的磨坊”是这类作品的代表。概括地說，斯拉維支的短篇小說的主要的主題就是这些。

在“布独里亚”中，两个主題交織在一起——一个普通人对知識的渴求，以及一个农家子想离开乡村去追逐名利的这种欲望。在这个故事的許多段落里，斯拉維支以他著名的細腻而准确的筆鋒，活神活現地描述了一个普通人对于文字的魔力所表示的惊讶。故事中的主角胡促的父亲布独里亚，会吹短笛、会吹风笛、会拉提琴，“总是笑着跟你答話”，他一开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会認字会写字。斯拉維支怀着同情心，用善意的幽默来描写他怎样逐渐理解了这件难以理解的事。一个人能認識自己写下的符号，这一点他能理解；經驗告訴他，他能認出自己在眼本上記下的符号。但是他无法理解胡促怎么能認得別人写的东西。后来，他发现书本上的符号都是一个格式的，于是他开始理解到“学者們都用同一种方式写字”。可是他依旧有点茫然。“这么多的人都能看得懂”，对他來說来“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他要胡促写出几件熟悉的物件的名称，——风笛、提琴，短笛，“风笛一点也不象风笛，提琴倒有点象小风笛”使他惊讶得說不出話来。布独里亚最后終于弄明白了书写的符号的意

义，这种理解在他胸中燃起了一种天真无邪的热忱，使他对自己儿子佩服到了极点，“虽然还是个毛孩子”，却已经会念会写，跟随便哪一个有学问的人站在一起，都不丢人。

但是，对胡促来说，学问也是飞黄腾达的进身阶。斯拉维支并不把他的英雄人物理想化。在他的笔下，布独里亚是一个有恒心，肯吃苦的孩子，为了继续他的学业，他吃了不少苦；可是，同时，他也是野心的俘虏，他对地位比他高的人卑躬屈节，阿谀奉承。

斯拉维支用熟练的笔调写出了胡促的野心如何随着他眼界的开阔而一天比一天扩大。胡促以他遇到的人为榜样，幻想着自己的前途，为这样的前途筹划。一开始，他只是希望象卡莱尼采一样当一名乡村教师。卡莱尼采本来希望胡促能娶下他的五个女儿中的一个，接替他的职务，所以这样很投合他的心意。可是，胡促进城去念中学以后，他心目中的榜样却换了一个，这就是他的教师翁得拉谢克。进了大学以后，胡促却又把自己的目标转移到宗教上，希望成为一个副牧师，他的野心既然愈来愈大，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抛弃了他早年的情人。“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了，再过一年，你看吧，不要紧，真的不要紧，这样倒也好。”他说。胡促娶了乡村教师卡莱尼采的小女儿米里，当了副牧师，又是督学，到处视察学校。

长篇小说“瑪拉”和另外几个短篇小说，描写了金钱如何破坏人们的生活，使他们丧尽天良。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问世大约十年以后，他创作了短篇小说“财宝”。这篇小说记述了一个贫苦农民杜都的经历，他在垦荒时从地里挖出了一大堆金币。自此以后，对金钱的贪欲和怕受旁人欺骗的疑虑支配了杜都的一切行动。他开始憎恶、怀疑自己的妻子。他一天到晚盘算怎样

把金币高价出售；他又梦想去經營商业，“弄到更多的錢”。他到了布加勒斯特，被一个又是演員又是妓女的坏女人迷住了。她垂涎杜都的財富，使他落到一群騙子和一个同样嗜財若命的警官手里。最后，他們騙去了杜都的全部財产。他回到家里，这一段經歷就象一个噩梦一样永远压在他心头。

在“吉利的磨坊”中，斯拉維支以更細膩的筆觸和更完善的技巧描繪了一个瘋狂地追逐金錢的人的墮落。

本来是个鞋匠的基达，成了“吉利的磨坊”酒店的主人，在貪得无厌的欲望支配之下，他不由地走上了最終的毁灭。他遇到了“头儿”黎薩，一个用一种可疑的身份——放猪人的“头儿”——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行徑的杀人不眨眼的强盜头子。黎薩的黨徒很多，称霸一方。这篇小說中說到的許多事實，都是斯拉維支在科默薩拉烏給一个公証人当文书时听来的。黎薩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惩处，“他举出了几个雇主的姓名，軍官知道沒有法子不让他走，黎薩是很会挑选主人的……”，所以，他被捕以后，拥有三个猪群的維尔梅西·阿尔巴德先生就来保釋他了。“其实，黎薩到底有罪沒有罪，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再說，誰見过每一个杀人犯都得要判罪？何况还有这許多体面的上等人和他們来往……”

斯拉維支分析了貪婪对于基达的腐蝕，又怎样把他弄得家破人亡。他爱他的妻子安娜，但是这种爱情却不得不屈从于他的貪欲和他对黎薩的畏惧。尽管妬嫉啃噬着他，尽管他也看出在当时籠罩着“吉利酒店”的气氛的困惑之下，安娜在黎薩面前快要把持不住了，基达却几乎是袖手旁觀地默認了他們之間的不正常的关系。他企图出卖黎薩，在一陣瘋狂的妬嫉下刺杀了安娜；自己也被黎薩的一个黨徒打死。黎薩在宪兵的包围之

下自杀身死。这个冷酷、悲惨的故事以几个主角的死亡而结束。

在这里，作者向穷人宣扬的是这样一种哲学——“知足常乐”。在作者的其他小说中——例如“财宝”——也可以遇到同样的人生哲学，只是不象这个故事那样富有戏剧性和社会意义。

金钱，这个毒化人们灵魂的东西，在农民们之间挖下了一道鸿沟。在“吉利的磨坊”和“财宝”这两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逆来顺受的倾向，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斯拉维支也宣传过要穷人和富人和解，这是一种基督式的，对于富人在穷人身上犯下的罪恶的宽容。这是斯拉维支的政治观点和他的社会观点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种矛盾在他的生活实践中也产生了影响，以致于他曾这样幻想过：德兰斯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居民，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哈普斯堡王室的统治下，也许会得到较好的待遇。当然，他的作品远比他自己认识到的观点更忠实地表现了生活——这是与其他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共同的。

在其余几篇小说里——“森林的女儿”、“村里的流言”、“在村口的十字路上”——不同阶级的农民们在他们的兴趣、思想和对未来的期待上的矛盾，阻挠了青年男女间的爱情，有时候甚至完全扼杀了他们的爱情。

有一位批评家说过：在“村里的流言”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观察家斯拉维支强调地指出，对于富农们，求爱和结婚只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仪式下进行的一注交易。嫁妆被展览出来；求婚者来到的那一天，米霍把全部家产都摆在院子里，洋洋得意地看着自己的“矫健的马匹……乳牛，贪嘴的肥猪，咩咩的山羊和温顺的绵羊……”

婚姻就是一笔交易——尽管那些伪善的人们还假惺惺地不

肯承認；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富裕的人不肯讓自己的孩子娶一個農夫的女兒，而貧窮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以及對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也不能容忍這樣的愛情帶來的羞辱。在“森林的女兒”中，作者描述了階級之間的敵意和仇恨怎樣挫折以至最終葬送了愛情。在“村里的流言”和“在村口的十字路上”這兩篇小說里，青年一代的堅持取得了老一代人的讓步，在“森林的女兒”中却不同，伊奧哥凡愛着西米娜，却又猶豫不決，自相矛盾，而農民尼亞克蘇的女儿西米娜最後也明白了是什麼東西橫在她和伊奧哥凡之間。

一八八四年，一群有錢的羅馬尼亞人的代表人士決定在德蘭斯瓦尼亞的西必由創辦一種報紙——“論壇報”。斯拉維支應他們的聘請，擔任這家報館的主筆。在他領導“論壇報”工作的這幾年中，他細致有方地做了許多在人民中傳播文化的有益的活動。

“論壇報”的后台老板們的政治色彩是溫和的进步派。雖然報紙曾經極力設法擴大銷路，而且企圖把德蘭斯瓦尼亞的全部羅馬尼亞居民團結在一起，但是，它的拘謹的方針只保衛了居住在德蘭斯瓦尼亞的羅馬尼亞資產階級的利益。與這個省份里其他民族——日耳曼、匈牙利——的資產階級比較，羅馬尼亞資產階級的地位是比較低的。

只要他們能爭取到一定的權利，只要爭取到執行某些代表他們的階級利益的政治和經濟措施的可能，“論壇報”的領導人物也就十分滿意了。但是，如果說報紙的內容代表了它的政治立場的話，那末，斯拉維支所擬定的在文化方面的路線却遠遠地超出了報紙本身的局限性。除了幾個顯然是由於不同的歷史情況和地方特點而產生的分歧之外，“論壇報”一直堅持着“人民的

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令人回忆起一八四〇年时候，一些以后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在一种叫做“达基亚文学”的刊物中所鼓吹的政治纲领。

在“论坛报”的版面上，也宣传了一种无论就其源流或者就它所定的目标上来说都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文学。这种文学从民间传说中汲取灵感，同时也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论坛报”发表过许多民间歌谣，也翻译过世界文学中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特别是俄国的文学作品：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长篇和短篇小说。斯拉维支这位“人民的现实主义”的倡导人，把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一同发表，这样，就为当代罗马尼亚文学提供了许多范例。

就是通过“论坛报”，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用了一个笔名，在一八八四年冬天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乔治·柯斯必克，罗马尼亚诗歌中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经在他们的引导下走上文坛。这不仅是“论坛报”的荣誉，也是斯拉维支本人的荣誉。柯斯必克给“论坛报”写稿的那些年，是他一生收成最丰富的年代，后来收集在他最初两卷诗集中的大部分诗篇，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十年以后，在一八九四年，斯拉维支在他主编的“炉边”杂志中，又继续了他主编“论坛报”的编辑路线。在这本由卡拉迦列、柯斯必克和斯拉维支共同编辑的刊物的发刊词中，明确地指出文学应当回到我们“祖先的炉边”。这完全不是象不久以后“播种者”派所采取的倒退的方针，而是一种倾向于“人民的现实主义”的方针，而且坚决拒绝了象征主义的诗人们所采取的“绝望的懒散”或者唯美主义。

斯拉维支的长篇小说“玛拉”就是在“炉边”上最初发表的

——这本小說到十二年以后才印成單行本出版。

“瑪拉”是斯拉維支唯一的長篇小說。它不仅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小說，而且在羅馬尼亞小說的發展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斯拉維支对心理分析的描写，很少有超过这本小說的。如果說他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反对“牧歌式的浪漫主义”和虛偽地美化乡村生活，那末，“瑪拉”就代表了与那种不現實的描写絕對相反的方向。

“瑪拉”的中心思想与前面提到过的某些短篇小說是相同的。金錢，以及对財富的貪欲使瑪拉从一个貧賤的菜販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店主。由于長篇小說形式复杂，在处理这个主題的时候，还穿插了家庭糾紛和德兰斯瓦尼亞地区的民族問題。“瑪拉，一个貧窮的女人。丈夫死了，她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可爱的小东西。她年輕，結实，勤儉，于是上帝想，她应当有好运气。”小說以这样一段微带譏諷的口吻开始。所謂运气，就是她的与日俱增的貪欲。貪婪不久便成了她性格中統治的因素，其他各种感情都被它淹沒了，窒息了。

起初，瑪拉还有一个借口——为了撫养她的两个孩子，特里沙和帕茜达。因此她才把全部家产变卖一空，买进了一批貨物。接着，她又在橫跨穆列希河的桥上当了一名收稅員，自己也开始放起高利貸来。为孩子前途的打算越来越被发财致富的欲望所代替，終于，发财本身变成了目的。斯拉維支描写瑪拉在計算过桥的稅款所能带来的財富：每过一个人二个克罗茲，每过两匹馬或者两头牛十个克罗茲。瑪拉数着这些錢，把它們加在一起，最后，錢的数目大到使她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她把錢小心地放在袜子里，藏在一边，她对于錢財的感情簡

直超过了她对孩子的爱。她最善于讨价还价，用这种方法，她差不多没花多少钱就把女儿帕茜达送进了修道院办的一所学校。轮到特里沙的时候，因为还价没有成功，而她又硬不下心肠来从袜子里向外拿钱，她只得放弃了让他上学的打算。

她爱财爱到失去了一切天性应有的反映和感情。在一个有高度戏剧性的场面里，她的两个孩子差一点没有在穆列希河里淹死，可是瑪拉却还在想着她在桥上收税能得到多少钱，而且也没有忘记计算她的克罗茲。

她的女儿帕茜达要分娩了，她赶着去看她，走到半路却又折回来，因为她想起家里放着钱，门上忘了上锁。这种统治一切的感情甚至也左右了她在道德问题上的准则。

她的儿子特里沙，一个皮毛商人的学徒，接到了入伍服役的通知。按照当时——一八五〇年哈普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德兰斯瓦尼亚——的惯例，特里沙只要付出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就能免服兵役。瑪拉知道特里沙的主母、皮毛商人的妻子瑪莎对他有意思，便公然唆使特里沙对她迁就，以换取免服兵役的那一笔款子。“这对你有什么妨害？丢的不是我的面子，也不是你——而是她的面子！当然，你说话应当谨慎！”

斯拉維支在分析瑪拉性格的逐渐转变时，着重描写了女主人公从一个菜贩变成一个有钱的商人以后，觉得自己已经当了主人而感到的无比骄傲。但是，遇到和贪欲冲突时，骄傲也可以低头让步。瑪拉想要向商人夸耀她打算给女儿帕茜达多少嫁妆。可是，当她的虚荣心得到了第一次满足以后，她就开始削减最初打算用来办嫁妆的钱，最后，她一个钱也没有拿出来。

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述帕茜达与那特尔的爱情以及民族歧视所给予他们的挫折。关于这件事的描写加强了“瑪拉”

这部小說对于羅馬尼亞資產階級的批判的意义。

帕茜达是羅馬尼亞族，而那特尔是日耳曼族。斯拉維支在这里又一次接触到居住在德兰斯瓦尼亞的各民族間的关系。这个問題他在短篇小說“紅十字”里曾經用諷刺的筆法处理过。在“瑪拉”中，斯拉維支在解决这个問題时，也同样采取了反对沙文主义的立場。帕茜达和那特尔的爱情最后战胜了人們的偏見。但是，斯拉維支也沒有把他的人物理想化。爱情的第一道光芒消失以后，那特尔又变成了屠夫胡巴尔的儿子，一个心胸狭窄、游手好閑、卑鄙下流的人，而帕茜达也一天比一天更象她的母亲瑪拉。

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斯拉維支繼續过着一个教員和作家的朴实的生活，不間斷地創作短篇小說和故事。

斯拉維支創作的第一篇童話是“晨曦仙子”。作为一个童話作者，他虽然比不上克里昂加——他在羅馬尼亞的童話艺术上达到了最高峰——但是他的童話却充满了幽默和幻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羅馬尼亞資產階級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支持協約国，另一派支持同盟国。这种分裂并沒有什么原則作为依据，只是由于各人依靠的金融家和銀行家属于不同的国家。

斯拉維支在战争期間采取的态度——与其說是坚决地反对战争，还不如說是由于对同盟国的傳統的同情——使他在战后被投入监狱。在獄中，斯拉維支遇到了与他同时被捕的社会主义战士們，尤其是那时领导工人起来斗争的伊·西·弗里莫。这次的相遇对于他的思想的发展起了特別重大的影响。这时正在一九二〇年前，在俄国革命的偉大榜样的刺激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隨即遭到了殘酷的鎮压。

几十年来，斯拉維支那生根在人民中的現實主义思想和他的模糊的政治思想一直有着矛盾；这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到底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一种不同的人民。

斯拉維支以他独特的真摯誠懸的筆調強調了他生活中这一段时期的重要性。他永远不疲倦地說到在监狱中度过的这一段苦日子对他的“好处”。

他給伊·西·弗里莫刻画的肖象表露了他对这位革命斗士的敬仰。这位曾經被資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者的反宣传的谎言所蒙蔽的作家，最后严厉地責問自己：“最后，你难道还不相信，破坏社会生活的基础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用鞭子鞭撻他們的人？”

几年以后，在一九二五年，已經被人遺忘了的斯拉維支在貧穷中去世了。上面那句問話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几句话之一。这句话所賦与他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和他的作品是一致的。他的作品今天在我們人民的心目中，已經成了最寶貴的文化財富。

西尔維揚·依奧西費斯古

高駿千譯

## 目 次

前 記 .....	1
森林的女儿 .....	1
吉利的磨坊 .....	136
布独里亚 .....	259